

打造“高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质”的 法学研究学术平台

——“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
法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综述

支振锋*

贞下起元，春兴冬蕴。1979年《法学译丛》行世，承1962年《法学研究资料》之余绪，启1993年《外国法译评》之转进，迨至2001年更名《环球法律评论》，刊名几易，折射出我国当代法学曲折发展而又进取日新的历程。三十四载，期刊始终致力于服务国家建设、助力法治发展、展现法学成果；通过支持中外法学的比较研究与交流融通，以便学界同侪悟取舍之正道，得法意之真髓，而风雅正宗，赖以不坠。

2013年12月1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冬日，北京沙滩北街15号院，由《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主办的“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新会议室召开。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两所领导，历任编辑和编委，《法学研究》编辑部、《国际法研究》编辑部，两所职能部门代表近4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两所联合党委书记陈甦研究员主持。《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刘作翔研究员、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和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陈泽宪研究员先后致辞。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34年的历任主编潘汉典教授、任允正教授、吴新平教授、吴玉章教授、徐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历任编辑、编委及与会嘉宾刘兆兴教授、陈春龙教授、马骧聪教授、肖贤富教授、张广兴教授、刘俊海教授等也纷纷发言。他们回顾了《法学译丛》、《外国法译评》、《环球法律评论》34年曲折发展而又进取日新的历程，表达了对这份法学学术期刊的深切关爱和殷切期望。最后，刘作翔主编在总结发言中，阐释了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和责任，他希望法学期刊携起手来，共同打造一个“高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质”的法学研究学术平台。

这是杂志创刊3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盛会。刊物各时期编辑人员重聚，取诸怀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研究生魏书音、刘振宇、包有鹏同学对会议录音的整理，以及硕士研究生邢浩浩同学对会议资料所作的整理。

抱,悟言于一室。在紧张而热烈的研讨中,与会者就《环球法律评论》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法治发展与法学繁荣献计献策,陈以高论。现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略作综述,以飨读者。

一 三十四年创新之路

据与会的老编辑回忆,《环球法律评论》最早的前身为《法学研究资料》,于1962年创办,专司译介前苏东法学资料,内部交流,但不久便夭折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文革”结束后,1979年复刊,易名《法学译丛》,初以译介苏东法学为主旨,但很快渐及西方与第三世界法学,公开发行,一时洛阳纸贵。

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迭遭巨变,欧风美雨浸润。西学经典蜂拥,提振中国学理。适值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翻译作品的版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法学译丛》因时而变,于1993年第1期更名为《外国法译评》,译和评两相兼顾。中国法学心智,始得呈现。

此后八年间,西洋东海,渐入彀中。中国法学局面大开,有以中国而逞世界之志。应时继事,《外国法译评》于2001年第1期再次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刊名几易,折射出我国当代法学曲折发展而又进取日新的历程。

三十四载,仰俯之间,一段日新而又厚重的历程,《环球法律评论》与中国法治共成长,与中国法学共繁荣。

二 薪火相传

道以传为功成,技以不失为大幸,没有传承的事物无所谓发展,《环球法律评论》之所以历风雨而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有薪火相传,不断在继承中发展。

李林所长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一个研究所来讲,很多东西都是过眼烟云,但是有一些东西注定是要留下来的,比如我们讲大师要留下来的,大刊要留下来的。”他深情地讲到:我们这个刊物就承载着这样一种承上启下,承载着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期待而保留下来。《环球法律评论》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今天到场以及没到场的所有人的共同的努力。当编辑非常辛苦,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篇译文、每一次为人做嫁衣裳,其背后的酸甜苦辣只有编辑自己才知道。是大家34年的努力,迎来了《环球法律评论》今天辉煌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

陈泽宪所长在致辞中讲道:《环球法律评论》走过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历程,它跟《法学研究》还不太一样,更为坎坷,更富有传奇色彩,这跟我们国家的法学研究和法治事业相适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缩影和折射。从最早的《法学研究资料》到后来的《法学译丛》(单纯地翻译)、《外国法译评》(翻译和评论并重)到现在的《环球法律评论》(反客为主),它也反映了中国在法治建设、法学研究过程中,中国自信和话语权逐步成长的一个过程。

徐炳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的34年,值得我们

传承的东西很多,但有六个字基本是客观的:第一是公正;第二是严谨;第三是团结。

曾任《法学译丛》编委的陈春龙研究员回忆:在当时,《法学研究资料》都是扎扎实实的东西,那时,《法学研究资料》为法学所、为全国从事法学研究教学的同仁提供准确的、原原本本的东西,实属难得。

曾担任过编委的肖贤富教授认为,“从《法学研究资料》、《法学译丛》发展到今天的《环球法律评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作为社会科学来讲,必须是要有传承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承上启下,承前启后。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共同回顾它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为了使这本杂志能够更好地发展。”他希望处在“青壮年时期”的《环球法律评论》今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也是新一代人的任务。

的确,在《环球法律评论》34 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始终坚守如石,立足中国,放眼国际,与中国法学共存共荣。

现任主编刘作翔研究员在会议开始致辞时特意做了说明:基于对历史负责,根据杂志上的记载,编辑部把自创刊至今所有发生过的人事变动情况都做了记录、整理和搜集,制作了《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编辑人员名录(1979-2013)》。据不完全统计,34 年间共有 50 多人在编辑部从事过编辑或编委工作。虽然人员变动频繁,但也人才辈出,不仅为法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编辑部自身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

据初步统计,曾在编辑部工作过的已故前辈有郭布罗·润麒、吴大英、谢怀栻、陈汉章、李泽锐、周叶谦、郑成思、朱坚根,等,我们对他们深深地缅怀;他们不仅为刊物做出了贡献,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成为引领者。

从到会的人员情况来看,不仅有九十四高龄已成法学界泰山北斗的法学耆宿潘汉典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法学家,还有在法学界正在辛勤耕耘的盛年学者,编辑部自己也培养了不少青年学者,有的已经在法学界崭露头角。

刘作翔主编认为,期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法学译丛》的时代。他说,“《法学译丛》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很难超越的。《法学译丛》时代是我们这本杂志的辉煌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法学译丛》曾经引领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时代潮流,对中国法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法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启蒙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的法学工作者。”刘作翔谈到,《法学译丛》是他在上大学时自费订阅的三本杂志之一。在他读研究生期间,正是读了由潘汉典教授翻译并发表在《法学译丛》1985 年第 1 期上的美国学者 L. S. 温伯格与 J. W. 温伯格著的《论美国的法律文化》一文,受此启发,开始关注法律文化问题。在他看来,《法学译丛》当年所发挥的作用着实是今天年轻的学者们可能体会不到的。

李林所长认为,“刊物三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正好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的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从拨乱反正到今天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辉煌篇章的新起点。我们的《环球法律评论》、《外国法译评》、《法学译丛》见证了这段历史,并对这段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说,如果把《法学研究》比为“中餐”的话,《法学译丛》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西餐”,中餐和西餐都是我们的大餐,都是我们精神的食粮和营养。他回忆道:当时要是哪一期《法学译丛》没有看

到,哪一期里边自己感兴趣的某篇文章由于某种原因丢失了(因为那个时候复印条件很差,个别的学生、有特别喜好的人士会用小刀片划下来作个纪念),会特别的遗憾,要千方百计给它找回来。这充分地说明,当时大家知识饥渴、资源饥渴、外来信息饥渴,在信息不通畅的情况下,《法学译丛》打开了一扇看世界法学和法治的窗口,从世界吹来一股最新的法学知识和法学营养的空气,让改革开放以后学习法律的人能够尽可能及时地、尽可能前沿地、尽可能为我所用地了解世界的动态,了解全球法学的发展情况。

《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兴研究员也认为,《法学译丛》、《外国法译评》和《环球法律评论》对于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历史史册的。

三 未来之路

34年的办刊史,实则是一段不断克服困难、精益求精的超越之路。当前同样面临诸多的问题,当然这不单单是《环球法律评论》面临的问题,更是所有法学期刊及学术发展面临的问题。

刘作翔主编指出,历史不会重复。现在中国法学期刊的数量已经比当年增长了数十倍,办刊环境、办刊氛围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二、三十年前,法学期刊数量很少,对刊物也没有什么评价体系。而现在,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纷至沓来,对办刊既有正面的积极促进功能,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怎么样继承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34年来积累起来的优良传统和办刊经验,使杂志能有一个更好、更高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陈泽宪所长认为,现在办刊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只是《环球法律评论》,也包括《法学研究》,不经意间就会发现面临的形势非常地严峻,这跟现代媒体的兴起有关系。怎么跟现代媒体,包括数据库等处理好关系,互相借助,我们过去重视得不够。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它的一些评判标准和社会认知可能跟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会有差异,对此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吴玉章教授认为,《环球法律评论》未来发展的任务还很重。怎么样在法学刊物之林当中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而且越走越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怎么样在学术刊物之林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马骧聪教授认为,刊物经过几次改名,发展到现在,办得是很好的。他说,《法学研究》和《环球法律评论》是法学研究所的两个名片,两个品牌,一定要与时俱进,越办越好。当然现在和过去确实不一样,过去《法学研究资料》在全国都是很少有的资料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所以当时很珍贵,现在刊物太多了,办起来就很困难。

潘汉典教授的发言充分展现了他的时代意识、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他认为,今天的中国,跟《法学译丛》时代大不相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也大不相同,这赋予了我们每个公民新的任务,不仅是对某一国家的任务,还有对全世界的任务,对世界人民都有责任尽我们的贡献,特别是法学。法学在当今国际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加强比较法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比起《法学译丛》创刊时,我们今天已经迈出了很大

一步,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国家发生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他认为,比较法研究应当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要注意我们面临的任务,过去我们强调效仿英美或苏联的法律,今天的任务不仅是这样的。我们《环球法律评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重要性,重新加以估价和考虑。

曾经担任编委、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的刘俊海教授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一定要把中国的法律思想通过《环球法律评论》传播出去。中国要走出去,不只是资本走出去,也不光是卖商品,中国下一步是要卖思想,把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法律文化销售到全球去。第二,要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要有外国没有的东西,也要将中国的思想理论贡献传播出去,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此外,在引进外国思想时要进行选择。所以我们的定位一定要高,要使《环球法律评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优质资产,成为对外交往的窗口,成为中国了解外国、外国了解中国的学术平台。

刘作翔主编提出了期刊的一个发展目标:法学期刊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打造“高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质”的法学研究学术平台。刘作翔主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回应。

李林所长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环球法律评论》务必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价值,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品格。第二,进一步强化理论和学术定位。第三,一定要坚守特色。我们的刊物之所以在法学界、法律界乃至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有我们的特色。第四,希望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质量是生命,务必要把质量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平台上来对待和要求。

任允正教授提出了七点建议:第一,领导要重视。法学所的传统是,领导对期刊的重视,表现在很放手、不干预上。第二,要有好的、稳定的团队。第三,开门办刊。一个就是经常听听大家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另外一个就是扩大稿源。第四,关于内稿、外稿的问题。不管内稿、外稿,质量为主。第五,应当把刊物办活,要丰富,要什么感想和声音都有,刊物办得好,至少人家愿意读。第六,培养和发现新秀也是编辑部的重任。第七,除了热点问题可以介绍之外,还可以搞些专题的研究。

吴新平教授建议,不要完全排斥翻译稿件,特别是对于真有价值的、水平确实很高的外国教授的东西。评论是广义的,外国人也可以评,不要排斥外国人写的文章。

刘兆兴教授认为,在我们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学习的最好机会,编辑也要自己搞研究,不要光做别人的嫁衣。

用刘作翔主编的话讲,这是一次“既不逢五也不逢十”的研讨会,但出于一种历史感和紧迫感,编辑部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在并不充裕的时间里,与会者提出了大量有益而又有效的关切与建议,令人回味无穷。而今,世易时移,经济发展改变国际格局,科技创新改变生活方式,中国改革正待全面深化,法学研究亟需深刻变革。“克绍箕裘,踵武赓续”,由“而立”走向“不惑”的《环球法律评论》将继续与法学界同仁一道,秉持中国关怀,保持国际视野,坚守学术品格,强调问题导向,注重比较研究;不拘一格,兼容并包,一如既往地支持法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倡导学术研究的贡献意识。